

生來命苦，卻不一定潦倒——訪劉紹銘教授

採訪、撰文：余結珊（香港城市大學）

相信了解劉教授的人都知道，他童年及年輕時有過不少經歷。童年時，試過在不同行業的工作打滾，在的士行當接線生，印刷廠當童工，又試過在書店當文員。大學時期，他到台灣留學，不久在美國華盛頓大學當英語系研究生，其後輾轉到印第安那大學修讀比較文學。回顧過去這段「多姿多彩」的經歷時，劉教授以「生來命苦，不一定要潦倒終生」作為他這經歷的一個總結。

### 麻繩當鬧鐘

為何劉教授會說自己「生來命苦」？那要從童年時說起。他和胞弟小時候都寄養於伯父家，因生活艱難，有時難免連自己唯一的心頭好也要犧牲。曾經兩次把自己心愛的物品拿到當舖，為的是換幾張鈔票，這段經歷對他的童年做成了一個創傷，自此以後，每次把自己心愛的東西奉上，都有種痛不欲生的感覺。

生活逼人，為了幫補家計，劉教授曾經當過沿街叫賣的報販，清晨開始走到兩三里外的批發商拿報紙。十六歲，到計程車公司當「童工」，當時他窮得連鬧鐘也買不起，即使有鬧鐘，又生怕吵醒同屋人，所以只好跟弟弟用麻繩互相捆著自己的手足，誰先翻身便把對方拖醒，代替鬧鐘的功用。這方法似是很愚蠢，但卻湊效得很。

在計程車公司當童工的期間，生活日夜顛倒，當完夜班後又怕早上回家吵醒家人，唯有在公司閣樓搭個臨時床位，在那裡稍稍休息，但是車房經常有車出入，不易入眠，弄得一天也睡不夠三四小時。在這樣的工作環境底下，身心都疲憊不已，身體很快便支撐不了，不到一年，已經患了初期肺病。

經歷過這樣的一場病後，只好轉換工作環境，以免舊病復發，所以他經伯父介紹下輾轉到一間文具店去當文書，負責「洋務」一職，處理外埠信件及辦理信用狀事宜，迫得他把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字典上，自修苦讀英文。工作兩年後，又轉到學校當「黑市小學教員」，空閒時就到英文專科學校唸書，其後更取得皇家認可的會考英文中學文憑。

### 鋌而走險的留學

劉教授雖然能入讀台灣大學及順利畢業，但往後的路卻不是一帆風順。手執台灣大學的畢業證書，但處身那個時候，即使回到香港或留在台灣工作，一樣前路茫茫，加上當時台灣留學風氣盛行，進退兩難之際，他只好來過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，到美國留學去。

現在的大學生到外國留學，能受到各方經濟上及精神上的支持，學校有資助金，政府也伸出援手。相反，劉教授當年跑到美國留學，並沒得到任何助學金，生活沒有保障，更得不到未婚妻的諒解。當時他到美國留學，手上卻只有一張船票和不到兩百美元現金，他形容這是「鋌而走險」。畢竟二百元的美金不能支撐多久，如果不好好想办法，即使得到大學取錄亦無法支付學費，生活費更是沒有著落，屆時人在異鄉，想得到任何援助便是難上加難了，但他還是選擇了走這個「險」。

抵達美國後，住的是簡陋的房子，有一陣子早餐是麵包加自來水送服，靠當兼職來賺取生活費。在朋友的介紹下，他到唐人餐館打工當「企枱」，周六和周日都工作十多小時，完成工作回到家後已是凌晨，身心疲累，還那有時間和體力認真對待家課？精神集中不來，老師說的話聽不進，但學期終教授仍給予一個「合格」的分數。他現在想起，亦覺得是教授「慈悲為懷」。

但要繼續修讀研究院，必須有足夠的學分，為了預謀後路，他只好申請轉學，碰碰運氣，幸好得到印第安那大學的取錄修讀比較文學，還附有獎學金，這樣便再不用為生活費及學校而費神。但當上研究生後，卻發現老師以德、法及拉丁文授課，自己聽不懂，課堂追不上，功課越來越多時更壓得喘不過氣，只好硬著頭皮到圖書館找資料，小心謹慎的應付每樣功課。在專注和努力下，他最後終於順利完成博士課程，到威斯康辛任教。

看著劉教授現在的成就，我們便能明白為何他會說「生來命苦，不一定要潦倒終生」。雖然在剛起步時遇到不少阻撓，嚐盡苦頭，但最後亦能有所成就。劉教授這個活生生的例子能鼓勵不少年輕人，但他還是勸勉同學：「若想到外國求學，經濟上不能沒有保障。我走險的路子，千萬別『借鏡』。」